

2009

聖域踏尋：

近代漢傳佛教史的考察

江燦騰自選集



本書是以跨學科對話的多元探索視角，精選作者生平最具代表性和開創性的學術論文，並大量納入作者關於宗教研究方法學的各類型作品和具批判意識的專題論述，所以是此領域的最佳研究入門專書，也是了解當代兩岸漢傳佛教史研究現況不可或缺的力作，千萬不要錯過！

江燦騰

博揚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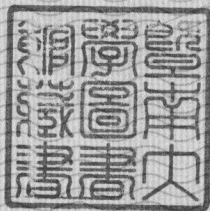
2009/1/1



2009

聖域踏尋：
近代漢傳佛教史的考察

江燦騰自選集



宗教學者經典 04

《聖域踏尋：近代漢傳佛教史的考察》

作者／江燦騰
發行人／張瑞香
總編輯／楊蓮福
主編／李淑芬
封面設計／黃國洲設計工作室
排版／王立群
讀者服務／吳秀卉

出版者／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47 台北縣蘆洲市長安街 269 號 3 樓
電話：(02) 22882330 傳真：(02) 2281-2104
E-mail：boyoung2008@yahoo.com.tw
劃撥帳號：18871684 戶名：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印刷／皇城廣告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235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 880 號 14 樓
電話：(02) 8227-5988 傳真：(02) 8227-5989
ISBN 978-986-6543-05-0
定價 500 元
2008 年 12 月 初版一刷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聖域踏尋：近代漢傳佛教史的考察／江燦騰作
．-- 初版 -- 臺北縣蘆洲市；博揚文化，2008. 12
面；公分．-- (宗教學者經典；4) 含索引
ISBN 978-986-6543-05-0(平裝)
1. 佛教史 2. 文集

228. 207

97023576

本書目錄

- | | |
|----------------|----|
| 1. 關於本書..... | 1 |
| 2. 我的學思歷程..... | 3 |
| 3. 照片..... | 17 |

第一卷 中國近世佛教的社會及其思想變革

- | | |
|-------------------------|----|
| 1. 晚明佛教復興運動背景的考察..... | 24 |
| 2. 明代佛教社會長期發展的歷史環境..... | 38 |

第二卷 近代東亞國際交流與殖民地台灣的佛教研究

- | | |
|---------------------------------------|-----|
| 3. 近代（1895-1945）殖民地台灣佛教變革史研究的再檢討..... | 106 |
|---------------------------------------|-----|

第三卷 兩岸現代化漢傳佛教的多元發展

- | | |
|--------------------------------------|-----|
| 4. 胡適來台前新禪學研究的肇始及其發展和爭辯..... | 158 |
| 5. 從《袈裟塵緣》看大陸新佛教文學的創作..... | 199 |
| 6. 關於佛牙舍利真偽之辯：內幕、證據與方法學..... | 217 |
| 7. 當代台灣佛教撕毀「八敬法」與「人間佛教」思想的爭辯始末... .. | 223 |
| 8. 南懷瑾：一個精明的現實主義者..... | 231 |
| 9. 作為當代台灣人間佛教思想源頭的大虛與印順分歧之辯..... | 241 |

第四卷 方法學的反思與多視角詮釋的對話

- | | |
|---|-----|
| 10. 台灣傳統齋堂史研究的新典範：
王見川的治學歷程與台南「德化堂」史的研究問題..... | 264 |
| 11. 增田福太郎與傳統台灣宗教的研究..... | 272 |
| 12. 台灣本土宗教研究百年經驗的反思與商榷..... | 299 |
| 13. 關於台灣近現代佛教的研究經驗與批判意識答客問..... | 329 |
| 14. 「台灣與東亞宗教研究」專號序..... | 342 |
| 15. 關於“弘一大師傳”的寫作與史料問題：敬答陳慧劍先生..... | 348 |

16. 公道何在？——駁幻生比丘的〈為印順導師說幾句公道話〉 352
17. 當代大陸佛教畸形發展的反思與商榷：
來自台灣佛教學者的觀察和批評 359
18. 評介張聖巖著《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 367
19. 評介聖巖法師著《明末佛教研究》 374
20. 評釋果祥著《紫柏大師研究》 380
21. 深沉悼念英年早逝的現代禪倡導者李元松先生 385

附錄

1. 「社會禪」的兩個新典範：關於荒木氏《憂國烈火禪》
與江氏《曹溪之願》兩書之比較 387
2. 人間佛教與臺灣佛教的主體性探索——評介江燦騰新著
《臺灣近代佛教的變革與反思》 407
3. 江燦騰著作目錄 421

本書索引

關於本書

這本「宗教學者自選集」，和我過去所出版的佛教史的專書或精選集，都大不相同，除了根據本叢書挑選的三大原則：一、重要性，二、影響性，三、新近性之外，還特別考慮到多元詮釋角度的研究觀點之擇取，以及跨學科方法學研究經驗的對話與批評。

所以，本書是我多年來，鑽研東亞宗教史、參與當代台灣宗教改革運動、以及嚴厲質疑其他宗教學者論述有效性的不足、或公開揭穿某些宗教人物蓄意欺瞞社會大眾的惡行等各種行動之餘，最具個人研究或評論特質的“多面性綜合自選集”。

再者，長期以來，兩岸的宗教學者，已有不少人對我的佛教史著作，或引述，或寫書評；其中有高度激賞的，有極端排斥的，當然也有不盡然認同的。只要透過那些形形色色的反應，即可看出我所面對的來自學界各方的「爭議性」，是從未間斷的。

但我認為，只要對方的學術態度，是認真而無故意扭曲之處（例如只要不離譜到像大陸某後進的青年佛教學者，在其博士論文中居然認為戰後的台灣佛教，僅是從大陸江浙地區傳來的“經懺佛教”之翻版；更無稽的是，他又誤認我是主張台獨的本土佛教學者，因而在其著作中對我展開各種汙蔑和批判），則不論我是否能贊同對方的意見，我都會以尊重態度來包容，也認為這是正常的學術表現。

反之，在台灣有許多宗教學者，更常遇到的情況是，當他很辛苦地才出了一本精心撰寫的專書或論集，居然不曾有人去討論它；或只在送書時，聽到對方客氣地說聲：「謝謝！」然後把書就往書架一放，從此再也不曾將它翻開讀過一遍。若遇有不識相的送書作者問起，就隨口回說：「真不錯呀！可惜，我太忙，還未細讀。」

所以，台灣的宗教學者之間，真能互作學術交流或長期切磋研究

的，相當少見。大陸方面的宗教學者，就我所知，也和台灣的情況相差不遠。如此惡性循環的結果，就是很少有夠水準的宗教學研究書評出現。於是在一片互相敷衍的客套中，只看到大量平庸的研究成果，很少看到能提出具突破性的力作，讓有識者為之扼腕或搖頭！

基於以上的考量，所以我甘冒學界的大不諱，將歷年發表的各類文稿，加上幾篇新作，從標題到內文，全都進行部分修訂或重編，然後依其內容和性質，大致區分為四卷如下：

第一卷 中國近世佛教的社會及其思想變革。

第二卷 近代東亞國際交流與殖民地台灣的佛教研究。

第三卷 兩岸現代化漢傳佛教的多元發展。

第四卷 方法學的反思與多視角詮釋的對話。

所以讀者可透過以上各卷的性質和內容，挑選自己有意先讀的研究專文或相關評論。只是，正如我在書前撰寫的〈從愛歷史到研究宗教史：我的學思歷程〉一文所自我描述的那樣，我個人其實是在艱困環境中，靠長期自學和多重嚴厲磨練，才成為當代台灣的一位宗教史研究工作者。

所以，我不慣於社交，也學不會彬彬有禮，或擅講客套話。有話直說，一針見血，就是我一向的表達形式。

因此，如有讀者看到書中某些篇章，語氣稍嫌火爆或過於自滿，我必須說：請你要體諒，那是有針對性的，而不是有意讓你不悅的。

這就是我的「本來面目」，以原汁原味的個人研究風格，在讀者前展露無遺。而我既然是以如此的「本來面目」來和讀者，作真誠的學術交流，也希望讀者不吝指教！

2008年10月30日

於台北市北投中和街宅

從喜歡歷史到研究宗教史 ：我的學思歷程

一、早期來自大溪國小的歷史啟蒙

我生平從未作夢過，我有一天會進台大讀歷史研究所，更不要說能夠以撰寫台灣近代佛教史的長篇論文，獲得台大歷史所的文學博士了。

我的初、高中的學業都靠自修完成，並先後通同等學力的考試而取得及格證書。所以，除了大學之後的正式學歷，我唯一曾讀畢業過的學校，就是桃園縣大溪國民小學。

有一次，當我翻開有關大溪國小的百年紀念集時，發現其中共列有日後曾獲博士學位的十位校友，而我是百年來唯一的台大文學博士。

不過，我所就讀過的當年大溪國小的教學環境，的確是我日後萌生研究歷史專業的最初啟蒙處，但如今我已忘記是在哪間教室了。我只清楚地記著那間教室的後牆上，高掛著一長幅的中國歷代彩色年表，而從我第一眼看見它，就被完全吸引了。所以我立刻將其背熟下來，並牢牢記記住它，之後它便伴隨我過了大半生。

我也在當時藉著這個歷史分期的時間架構，開始進行必要的內容填補和展開相關流變的思考。所以，在國小的三年級時，我已能靠勤查字典和再三苦讀，終於看完從鄰人借來的已老舊、微破的五分冊版《三國演義》的全部內容。

之後，幾乎在一夕間，我發現自己，居然成了村里唯一讀過全本《三國演義》內容的新一代權威。

而當我親眼看到昔日不可一世的鄰居權威，竟然在我對《三國演義》的全部細節，皆能博聞強記和能適時引書為據，來質疑對方“所言與書不合”的尖銳衝擊下，脆弱地整個崩潰時，同時也清楚地意識到自已，已不再是過去那個經常被歧視和毫無自尊的奴性無知幼童了。

自從有了這種自覺後，我便開始養成自動早起朗讀課文的習慣，記憶力也跟著日日規律的磨練迅速增強了，於是在同年級中，所謂課業優異的「天才」讚譽之聲，不久對我就成為理所當然了。

二、初一學業中輟與長期自學的開始

國小畢業後，我選擇升學，並有強烈自信，能考入好學校。可是由於家境清寒，雖仍如預期，以第五名的優異成績考進大溪初中，並獲母校大溪國小頒發一支「留美黃振榮博士紀念鋼筆」以為獎勵。但初中才讀一年級，就被迫輟學了。又由於學歷低和未成年，因此到社會上只能從事勞力或跑腿的基層工作。

此後，在社會上，為糊口謀生，奔波了18年之久，自水泥工、雜貨店送貨員、照相館學徒、機關工友，到外國公司的中級技術員，所走過的每一步，都是崎嶇、坎坷的。

雖然在這樣絕望的情況下，我仍然不斷地閱讀自己喜好的書籍。我曾讀過曾國藩編的《經史百家雜抄》或像《史記菁華錄》、《文心雕龍》之類的中國古典名著。我在台北市早期的牯嶺街，從舊書店的廉價古書堆中發現它們，立刻掏錢將其買下；但在閱讀時，只選自己能讀懂的，其餘就暫時擱下。

我不曾想過要請教別人（當時周遭也不可能有可能請教的人），但我認為別人能讀懂，一定是有方法可循，不然這些書不就成了無人能懂的天書？所以面對這些千百年來，無數古人已讀過的古典名著，雖然短時間內，可能還無法全懂或深入，但我一點也不擔心，深信只要時間夠，就一定可找到破解書中奧義的有效途徑。於是必要的治學方法書和實用的大型

工具書，視需要立即添購，也隨之成了恆常的購書習慣。且此癖形成之後，雖歷數十年，仍一如往昔。

我也花錢買了大量翻譯的西洋歷史名著、長短篇小說集和哲學書籍，藉以來進修史學和文學方面的素養。法國小說家羅曼羅蘭和舊俄小說家托爾斯泰是我最喜愛的作家。而希臘悲劇的感人劇情和《柏拉圖對話錄》中對蘇格拉底的生動描述及其臨死泰然自若的莊嚴風範，都深深影響了我日後的治學思考和行事風格。

於是藉著報名文壇前輩穆中南先生辦的「寫作函授班」，讀了相關函授的文學資料三個月後，自覺練習文學的寫作技巧已略有增進了，於是就開始在每期的《文壇》月刊上，發表大量關於世界文學的評論和短篇散文創作。

但半年之後，發現自己以為已累積了很豐富、甚至可以取之不盡的腦中材料，當真正持續地將其用在每月的大量寫作和發表之下，居然很快耗光了。

當首次出現知識方面的不足感之後，對西洋文學的專業素養不夠的警訊，立刻接踵到來，令我為之震驚和心虛！當下我便在心裡告訴自己：「我還沒準備好，我還要有更多的準備，我還需要有更長期的粹練才行！」

於是我不顧穆中南先生的一再勸阻，自動終止了第一階段的文壇筆耕生涯，再度進入先前已有經驗的自行大量閱讀的日常作息。

此後，由於生活中，除了工作外，其餘時間就是用來讀書。因此常覺與古人為友，非常容易知心，也不會如現實生活中，常遭外界投射鄙夷或歧視的眼光。反之，每當一讀到書中有精妙見地時，心領神會之際，就宛如與千古知音，靈犀互通，再無生死之隔和時空之遙。

因此，讀書就是我長期孤寂生活中的最大安慰和最大樂趣。

日後（1992年），我還曾把此時的一部分個人作品結集成書，取名《世界心靈的探索》，封面的副標題是則〈無悔齋青春讀書錄〉，交給當

時由吳武夫先生所新創的東宗出版社刊行。

不過，很意外地，有一次，吳武夫先生，突然對我說：「…你雖很會讀書和很長於思辨，但你還未領略過擁抱真正美女的無比銷魂，也未嚐過飲高級美酒的難忘滋味！」我當時則回以：「這兩者都不是我人生中，所要追求的最高目標！所以，我對於酒一概不沾。」這樣堅定的答覆。

三、胡適的死亡和李敖的崛起旋風

1962年，胡適在台北逝世，而以李敖、葉青、鄭學稼、胡秋原、徐復觀等人為中心的「中西文化論戰」，則由於牽涉毀謗訴訟，被台灣報紙大量報導。使我這一個從鄉下到台北辛苦謀生的失學者，一個原本根本不識「中西文化論戰」為何物的無知青年，透過每天努力閱讀新聞和不斷地找人詢問，居然被此一問題意識所激發，心靈中一扇通往「五四」文化之門，便為之開啟。

1966年至69年間，我在軍中服役，於台中水湳基地遇到王俊嶺少校，他後來於1970年，在台南市忠義路的湛然寺出家，法號水月。透過他的介紹，我開始閱讀梁漱溟、熊十力、湯用彤、歐陽竟無等人的著作。這段期間所吸收到的資訊，深刻地影響了我日後以中國近代佛教史為核心的研究取向。

四、參與東方宗教討論會

戰後台灣地區有關各種宗教研究的活動和組織，真正曾促使年輕的宗教學者，在新模式討論會的實驗中，產生革命性變革的，據我所知，應是從1983年起開始成立、名為「東方宗教討論會」的會員所推動的。這是在解嚴之前由當時台灣學界對一群對宗教研究有興趣的年輕教師和研究生，所發起的非正式組織。

此一組織自創立成立後，為了避免遭到來自外界的不必要干預，以及能長期維持宗教學術討論的中立性，始終未向政府正式立案，直到解嚴之

後被另一新成立的「台灣宗教學會」所合併時，依然如此。

我是在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夜間部就讀時，曾認識了系上擔任助教的顏尚文先生，後來考上台大歷史研究所，又有我在師大的恩師王家儉教授的來信，要我留意新出現的「東方宗教討論會」這個組織，並建議我找顏尚文先生牽線，所以我才正式加入這個組織。但，為什麼當時會有「東方宗教討論會」這個組織的出現呢？

這是由於當時台灣各大院校的老師及研究生，在研究台灣地區各種宗教時，往往會發現各學校或研究機構，不但有關宗教研究的參考書籍很不足，個別學者之間，也缺乏對不同宗教有高度認識的同道來請益或相互切磋；而當時正是台灣社會在政治及其他方面激起各種變革運動的震撼時期，因而彼此都感到，如果要在有關台灣各種宗教的研究上有所突破，一定要結合現有的人力資源，不分宗教類別和研究專長，但一定要有一常態性的、長期的、並且是全然開放、多角度切磋的討論活動，才能使大家真正受益。因此，一個名為「東方宗教討論會」的鬆散的宗教學術組織，就這樣成立了。

「東方宗教討論會」從成立之後，有十幾年間，其活動的方式，通常都是在每月的第三個星期六下午舉行（※此活動稱之為「月會」），大約進行三個小時，擔任發表者每人事先要印發新論文給參與者，讓大家事先閱讀和查資料，並邀請相關專家擔任講評，然後在進行開放但認真的學術辯論。除此之外，每年還有一次「年會」，進行一天或兩天的多篇論文討論。最後，還將該年度已討論過的優秀論文，加以選刊出版，學報的名稱叫《東方宗教研究》，前後發行多期，是國內外享有極高學術聲譽的刊物。

有關「東方宗教討論會」成立後的影響，當然還有許多方面可以提及。但此處只提一個事實發展，即「東方宗教討論會」最初成立的時候，雖可能只是作為一個研究宗教的「同仁團體」來運作。然而，由於當時在「東方宗教討論會」每月的「月會」進行討論時，其特色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每次都要結實地切磋三個小時才肯罷休，且都只討論一個主題；而且

當時擔任報告的每一位作者，毫無例外，一定要事先交出完整的論文給大家閱讀，所以當時每次應邀擔任講評的或實際參與討論的眾會員，基本上都事先已讀過主講者的相關研究資料。

換言之，當時在講評者與作者之間，彼此對所要討論的問題都不陌生，並有能力進行深度的學術對話。所以，當時在每月進行的討論會上，不論報告者是否為教授或系主任，都無關緊要，大家當時唯一重視的是，報告者所提出的新研究論文，是否能在學術邏輯上嚴謹地成立？或其所使用的資料仍帶有瑕疵？以及此一新研究是否真的有其宗教學術上的一定貢獻等。

當時大家的共識是認為，每位來會的論文報告者，都必須接受來自各方的檢驗而毫無例外，且唯有經由像這樣的來自各種不同的角度的質疑或對話，才能進入所謂嚴格東方宗教學研究的學術殿堂，最後也才能判明此一報告者的此次研究，是否真正具有學術價值？而事實也的確證明，凡能經由像這樣的嚴厲學術磨練，不論對剛出道者或老練的東方宗教研究者，在研究經驗的累積和相關學術認知辨識力的增長，都是很必要和很有助益的。

所以當代台灣現存且活躍在第一線的重量級著名宗教學者，幾乎都有其一段當年參與「東方宗教討論會」的歷練和難忘的震撼經驗！

至於我個人，生平有關宗教史和近現佛教思想史的重要研究，以及因為過於鋒芒畢露而被揶揄為「殺手學者」，也都是從上述的定期的月會或年會的熱烈且認真的多元宗教學術交流中，才得以迅速地累積相關知識和高速大幅度的增進研究實務的各種經驗。

特別是在討論會後的會員們聚餐時，圍坐在餐桌邊和大家開放而無拘束的自由交談結果，其實際的收穫，可以說遠比任何課堂上所聽到的講課內容，都更快洞悉當代台灣本土各宗教的發展生態，以及研究宗教的珍貴文獻如何可以順利獲取等有用的田野經驗。

我就是因為參與這樣的討論活動和會後聚餐，才有幸而認識了多位當今已成重要學者的藍吉富先生、王見川先生和黃有興先生等，並因此和彼

等而成為多年來長期互相論學的師友同道。

而我最初的幾篇原創性作品，也藉著參與月會或年會的討論並相繼發表於《東方宗教研究》的各期上，所以很快受到兩岸宗教史學界研究者的密切注意和被高度肯定。

可以說，我日後作為一位專業的宗教史研究學者，所能擁有獨立研究的足夠能力，都是奠基於此時的難得經驗。

五、台大歷史所的精進歲月和正式從事宗教史研究

我進入台大歷史研究所時，按應考時的分組規定：即報考「一般史組」的錄取者，其研究年代的下限，必須在清代鴉片戰爭之前，不得撰寫中國近現代史的學位論文。

所以考取之後，我即前往請教當時以治荷蘭明清時期台灣史聞名的曹永和教授，想聽取他對我未來走向的學術建議。

對此很有經驗的曹永和教授，在和我作了一次深度的懇談後，即根據（一）我的個人治學經驗（二）現有的國際學界研究環境（三）我個人所述的既有學術專長、以及（四）曹先生年輕時的一段想作，但迄今未作的治學之夢：他曾受方豪教授影響，想研究明清之際的東亞佛教交流史（之一）、他甚至一度想出家（之二）——等綜合評估後，當場建議我在台大就讀期間，可以從明清之際的東亞佛教交流史作為切入點。

他認為，如此一來，將可使我原先就擁有的最強項——即對「佛教史」具有透視力和有豐富解讀經驗等——都因此而能夠整個地，移植到此一階段的研究和寫作來。

我聽了曹永和教授的此一建議，立即返家仔細思考，隨即決定接受此一有可行性的學術建議，並迅速展開自修古典日本語文，來代替原想學習古荷蘭語的輔助治學計劃。同時，也盡其所能地，展開對國際學界既有研究成果的蒐集和相關資料的閱讀。

而後，在兩位著名學者：台灣的張聖嚴博士和日本九州大學的荒木見

梧教授的精闢著作中，領受到治此一領域佛教思想史的要訣和相關知識。兩者中，尤以荒木見梧教授的對我的思考衝擊最大，並長期影響迄今。

但，上述兩者，都不擅長有關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知識，而我進台大歷史研究所之後，立即發現：當時最強的教學陣容，就是徐泓教授和劉翠溶教授所教的明清社會經濟史課程。所以，我在所中當主力課程來專攻的，就是明清社會經濟史課程，並且收穫很大。於是，很順理成章，我還想將其運用到明清之際佛教交流史的研究上。

然而，欲將明清之際佛教交流史與明清社會經濟史課程的相結合，其實相當困難，在當時，也乏合適的指導師資。所以，只好將治學目標，逐漸設法，轉為有關明清之際大陸區佛教社會與明清社會經濟史相結合的嘗試。

但在台灣從事明代東亞佛教交流史，如無長期的努力，以及一些外在的助緣，要想突破，而有高水準的表現，是相當困難的。所以此處我必須特別提到曾教過我「研究實習」課的孫同勛教授。

孫教授是當時中央研究院美國研究所的所長，是當時教研究歷史方法學方面的權威，由於我在上我的課時，一而再，再而三地發問，使他對我有極深刻的印象。因而期末繳交報告時，非常用心的批改我的論文，將原本一萬五千字的文章，改到三萬字之多。由於他對我詳盡的指正，使我豁然開竅，知道何為標準論文，這對於我的寫作有極大的助益。從此以後，我在論文及著述的分量上有極快速的成長。

因而，我在1989年11月，便出版了生平的第一本著作《人間淨土的追尋——中國近世佛教思想研究》。自問世以後，此書即相當受到好評。

以後，每年我都有新書出版。而我個人研究經驗的累積，也逐漸在這些著作中反映出來。

六、建立私人的專業宗教史研究資料庫

我是從台大歷史所的碩二年級開始（已參與「東方宗教討論會」之後），每年都撰寫大量的宗教史論文和相關書評，並且在完成碩士學位之

前，已相繼出版了兩本關於近代中國佛教思想研究的重要論文集。因此，同樣研究明末中國佛教史的聖嚴博士，私下曾向國內著名的新史學出版公司負責人高本釗募來半套共五十本的新史學所出版的《新修大正藏》中國撰述部，作為對我這位後進治學小成的貴重獎勵。

以後，也有佛教內愛護我的善心人士，循此慣例，贈送多套大藏經給我，使我從此不須為缺乏某些藏經，到處搬借或影印，以致勞累不堪。

但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國內佛教史學界前輩藍吉富先生。藍先生在自己所出版的或所翻印的各種佛教著述或史料的大套書中，除極少數外，幾乎都是以半買半贈送般地超低價格，先行托運到我的竹北住家，而我總是等接到書後再視經濟狀況，分次寄還所欠的全部書款。我也好奇地曾試著問過藍先生：為何他會對我如此抬愛？而藍先生則仍維持他一貫的幽默說：「那些書在台灣，別人都是買來擺著好看的，只有你會真正讀完它和去研究它，我不賣給你，要請誰來讀？」

之後，為了消化由藍先生處以超低價取得的大量佛教史料，我便自行從日本東京神保町千代田區的古書店用船運訂購了大批昂貴但重要的相關工具書或研究叢書，以便自己能夠建立起私用的小型宗教史研究珍藏資料庫。

如此一來，日後便可不畏任何國內圖書館對我下禁借宗教圖書的封鎖令。我當時主要考量的是，藉此才可以擁有有獨立自主性的研究參資料來源，不然就得放棄研究宗教史的素志或轉行從事非自願性的無奈研究了。

於是，經過長期的蒐集和採購，我終於擁有整整排滿三層樓牆壁的大量專業叢書了，足夠作各種宗教史研究之所需。接下來的就是，就是從東亞宗教史的研究視野，來探索各種可能的宗教史研究課題。

七、與新史學公司高本釗先生的一段奇妙的學術邂逅

邂逅新史學的高本釗先生，不論對我或對高先生，都說得上是人生中

最大的驚奇之一，且是在一種很奇妙的因緣下形成的。

因高先生是長期在台北市開設大型的佛教書籍出版公司的負責人，常接觸國內外著名的佛教學者，許多上下游的出版同業、書店經銷商、甚至連整個佛教界的有名法師和居士大德，他也認識了不少。

可是，二十幾年前，他首次邂逅我之前，由於我當時仍是一個年紀稍大的台大歷史所的研究生，既非佛教名人，也可能不曾買過高先生出版的書籍。因此，縱使他在台北市的馬路上遇到了我，也不會知道我是誰。

可是，像我這樣區區的無名小子，居然會讓大名鼎鼎的聖嚴大法師，想要贈我一件空前的厚禮——高先生在新史學所出的一整套《大正藏》。這是怎麼回事？簡直令高先生傻眼了。

另一方面，高先生與聖嚴法師，其實是很熟的，高先生也知道聖嚴法師是不亂花錢的；而且，在此之前，聖嚴法師只贈送南加大和私立東吳大學哲學系，各一套《大正藏》而已，卻從無贈個人之舉。如今為何他會有此異常之舉呢？

當然，聖嚴大法師之所以會告訴高先生，是因他向高先生勸募來轉贈我。

而高先生雖是真正要出錢且還得代人送書的大功德主，居然不知道所要贈書的對象是誰，可說有點令人啼笑皆非。

他當時唯一能知道的線索是，被指定贈書者，是一位叫“江燦騰”的台大歷史所的研究生。但在知道我的名字之後，不久於聖嚴法師所舉辦的一次國際佛學會議的場合上，當高先生在報到長桌處，看到我胸前掛著“江燦騰”的名牌，並正要簽到時，立刻毫不考慮地拉住我的手，並再次確認地問我說：「你真的是“江燦騰”本人？」我笑著回說：「是！」

然後，高先生告訴我，他叫“高本釗”，是新史學的老闆，正在找我。他接著又說，他要送一套聖嚴法師吩咐的《大正藏》給我，看我一共要幾本？

我當時回答說：「《大正藏》後半部，關於日本佛教的部分，可以